

原初“是”的渾一性

——沈子簠之“是”與代詞說和形容詞說

肖姪曼

內容摘要：最古一例“是”見於西周早期沈子簠“懿父迺（乃）是子”。對於此“是”，裘錫圭認為是指代詞，唐蘭則認為“是子”與“懿父”相對，“是”為形容詞。代詞說與上下文不符，且“是”不能被“此”替換；形容詞說雖與上下文相符，但與形容詞“是”出現時代不符。本文認為：此“是”為肯定義素和指代義素統一於一體的肯定性指代詞。它是後來各種“是”和係詞“是”的源頭。對原初“是”認識的困難是因為今天指代模式的制約。

關鍵詞：沈子簠 是 指代模式

係詞“是”的來源成因一直存在許多疑團。由此產生了“代詞說”和“形容詞說”（後者包括副詞說），前者能夠從形式上給予解釋，卻不能在語義根據上令人信服；後者能夠在語義根據上給予解釋，卻沒有材料的 support。一方面，係詞來源於“是魯孔丘與”^[1]一類“是”，從形式上表明，係詞“是”與指代詞“是”有承接關係；另一方面，係詞隱含確認義，從語義上顯示，係詞“是”與表示肯定的形容詞“是”有內在聯繫，即：

指代“是”	正確“是”
語法 \	/ 語義
係詞“是”	

學者們或持左方立場，或持右方立場，半個世紀來，爭論未有結果。

根據今天的語言觀，表示指代的“是”和表示肯定的“是”祇能是不同的詞。所謂不同的“是”，即指代“是”和形容“是”僅僅是偶然的語音和字形相同，因而既不存在共時的內在聯繫，也沒有淵源關係或共同來源。雖然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對此無庸置疑，可係詞“是”在來源上，却表現出與上古指代“是”和形容“是”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。正因為無法解釋這種奇怪的相互牴牾，係詞來源的有關問題長期不能解決。如果我們向上追溯，直到最初產生的“是”，我們會發現，它們並不相互牴牾，而是以一種我們過去不知道的方式統一於一體。

一 最早出現的“是”

“是”最初出現時的語義語法性質怎樣，對認識上古所謂指代詞“是”與形容詞“是”的關係有重要作用，尤其對認識係詞前身與係詞的關係非常關鍵，而探討這些問題，是以“是”的材料的原初和可靠為基礎的。

在反映商代語言實際的甲骨文和《尚書·盤庚》中，“是”字還沒有出現。就現有資料看，“是”最早出現於西周早期。西周金文中，僅見4例“是”，沈子簠、毛公旅鼎、毛公鼎、虢季子白盤各見1例。《周易》古經中有2例，西周初年的《詩經·周頌》中有3例，被公認是西周作品的十餘篇《今文尚書》中，也僅見幾例。裘錫圭先生說：“‘是’字始見於大約作於周昭王前後的沈子簠。”^[2] 沈子簠大約是西周開初六七十年的器物^①，上面出現了“是”。既然商代甲骨文中不見“是”字，西周早期金文中開始出現“是”字，而全部西周文獻中，無論是西周金文，

還是《易》《詩》《書》的西周材料，“是”的出現率都很低，那麼，基本可以確定，“是”字大約出現於西周初年或殷周之際。

西周的“是”就是原初“是”，沈子簋中的那例“是”就是最古老的“是”例，本文將考察的就是這首例原初“是”。在此之前，先概述一下其他原初“是”的有關情況。雖然《尚書》中有十餘篇被公認是西周作品，但因其中混有僞文，祇能撇開這些材料。下面是西周金文、《周易》古經、《詩經·周頌》中全部9例“是”：

懿父適（乃）是子。（沈子簋）

無唯正昏，弘其唯王智，乃唯是喪我或（國）。（毛公鼎）

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（《易經·未濟》）

是用壽考。（毛公旅鼎）

是用左（佐）王。（虢季子白盤）

時純熙矣，是用大介。（《詩經·周頌·酌》）

不顯成康，上帝是皇。（《詩經·周頌·執競》）

嗶嗶厥聲，肅難和鳴，先祖是聽。（《詩經·周頌·有瞽》）

弗遇過之，飛鳥離之，兇，是謂灾眚。（《易經·小過》）

九個原初“是”中，前三例至今是謎。至於剩下的六例，雖然一般認為是指代詞，但實際情況是，它們當中，祇有《易經·小過》“是謂灾眚”之“是”的語義語法性質明確清楚，即為作主語、起指代抽象事物作用的指代詞。其餘五例原初“是”，即使是持指代詞意見的學者也注意到，它們像指代詞，可又有幾分不像。尤其是上古數量最多的“X 是 V”格式中的“是”，有學者甚至認為是係詞^[3]。所以，這五例原初“是”的性質，實際也並不清楚。

《易經·小過》“是謂灾眚”之“是”，其語義語法性質雖然

明確清楚，但未必真是原初“是”。因為，在西周乃至春秋金文的全部近 30 例“是”中，沒有一例這樣用的“是”；《詩經》中不僅《周頌》，就是《雅》《頌》全部近 70 例“是”也沒有這種用法；《尚書》除後儒所補《洪範》中有“是之謂大同”¹ 例外，其餘全部 30 例“是”也都沒有這種用法。所以，“是謂災眚”中“是”的這種清楚的指代詞用法，可能已經不是原初“是”的用法，而是稍後的用法，即“是謂災眚”一句很可能是誤將傳文當作了經文。

因此，不祇是沈子簋等 3 例原初“是”，所有原初“是”的性質，實際上都不清楚。正因為作為源頭的“是”性質不清，係詞“是”的來源成因等問題纔疑雲重重。而要消除這些疑團，就必須從源頭上着手。西周文獻中全部 8 例“是”，對研究原初“是”非常重要，而沈子簋中這例“是”因其確鑿可靠和時代最古老，更具有其他材料無法比擬的價值。

二 沈子簋之“是”與“代詞說”和“形容詞說”

沈子簋之“是”因其確鑿和最古老而至為重要，但也因此最為棘手。雖然此例“是”處於上下文中，但它的語義語法性質仍使學者們深感困惑，一般對它採取存疑不論的態度。例如，臺灣《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》沈子簋釋文中，就沒有提及這個“是”^[4]。就整個上古的情況看，“是”的意義用法複雜，《漢語大字典》列出 20 個義項^[5]，其中主要用法有：①形容詞，正、直；②名詞，法則；③動詞，匡正、訂正；④形容詞，對、正確；⑤動詞，肯定；⑥副詞，真實、實在；⑦指代詞，表示近指、確指等。可沈子簋的這例“是”，無論講成哪一種，例如指代詞、形容詞、副詞，亦或動詞，都難講通。

雖然很少有人專門討論原初“是”的性質，但就對係詞

“是”來源成因的爭論中表現出的觀點看，可以說對原初“是”有兩種觀點：代詞說和係詞說^②。絕大多數學者持“代詞說”，但即使持“代詞說”者，也不能肯定這例“是”就是指代詞。例如，裘錫圭先生也祇說“似指作器者自己”^[6]，並沒肯定此例“是”一定是指代詞。實際上，並不僅僅祇是此例“是”似指代詞，上古早期所有的“是”都有這個問題。對西周春秋金文和《書》《詩》中“X是V”式中的“是”，雖然今天一般認為這類“是”為表示復指的指代詞，但學者們也注意到，實際上沒有“是”，這類結構的語法關係更緊湊，而且這些“是”都不能被“茲”“此”等指代詞替換。所以，它們雖有幾分像指代詞，又不完全像。沈子簋這例“是”比“X是V”式中的“是”似乎更不像指代詞。

儘管一般對此例“是”存而不論，却有兩位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一位是上面提到的裘錫圭先生，另一位是唐蘭先生。有意思的是，兩位先生對初例“是”的觀點竟然也可概括為“代詞說”和“形容詞說”。

為瞭解兩位先生的看法，本需介紹沈子簋全文，但鑒於再現金文較困難，這裏祇引“是”出現的末尾一段。下面的引文轉引自唐蘭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》^[7]：

也唯福，用水[順] 需令[命]，用妥[綏] 公唯壽[壽]。也用衷[懷] 埴[越] 我多弟子我孫，克又[有] 井[型] 敷[教] 歆[懿] 父迺[乃] 是子。（沈子簋）

“沈子”是沈國的子（爵位），沈子簋中的沈子名叫“也”，引文開頭的“也唯福”的“也”即沈子名。對“歆（懿）父迺（乃）是子”中的“是”，裘錫圭認為“是”“似指作器者自己”，即作指代詞；唐蘭認為“‘是’當讀如‘忝’，《說文》：‘愛也’”，即作形容詞。將“是”講成指自己的代詞有三個問題：第一，於文意不通；第二，上古“是”的用法雖然紛繁複雜，但沒有指代

自己的用法；第三，這個“是”不能用其他任何近指代詞替換。但是，裘錫圭先生這個意見又與上古“是”的總體情況相符。概括說來，裘錫圭先生是從“是”最初為指代詞的觀點出發的，而唐蘭先生是從銘文的語境和語言結構出發來判斷此例“是”的。我們認為，二位先生各自抓住了此例“是”的部分特點，此例“是”的確是一個指代詞，但它指示的是美德。

首先，“‘懿’作‘𡗗’，與班簠匡卣(yǒu)同”^[8]，對此，學者們看法一致，裘錫圭在文章裏就直接引作“懿父迺（乃）是子”。“迺”即“乃”學者們也無異議，但“乃”為多義詞，此處“乃”是何義？唐蘭認為：“此處作‘與’字講。”並論證說：“《大戴禮記·誥志》‘物乃歲俱生於東’，‘乃’當訓‘與’。”《漢語大字典》“乃”字下也有“連詞，表示並列關係”一義項，也舉《大戴禮記》此例，並引孔廣森補注：“言萬物與歲俱起於春。”這樣講，“懿父”和“是子”就是並列結構，“父”與“子”相對，“懿”與“是”也相對。“懿”為美或美德之義，這裏作形容詞；對與“懿”相對的這個“是”，唐先生也看作形容詞。

他認為：“‘是’當讀如‘𡗗’，《說文》：‘愛也。’”上古“愛”有形容詞仁愛之義。《廣雅·釋詁四》曰“仁也”。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：“及子產卒，仲尼聞之，出涕曰：‘古之遺愛也。’”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：“家大人曰：愛即仁也，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……”^③所以依唐說，“是”為“𡗗”，“𡗗”為“愛”，“愛”為“仁”，即“是”為“仁”。因此，唐先生是將此例“是”看作形容詞的。

雖然從時間上看，“是”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，但“愛”字出現稍晚，“仁”字大約出現於春秋^④，而儒家的“仁”這一概念的形成則更晚。從這一角度講，把“是”講成具有“仁”內涵的“愛”，可能並不準確。但從語義上講，形容詞“是”為正確或善，與具有“仁”內涵的“愛”一說却相通。如果不糾纏在

“是”“祗”“愛”（仁）的關係上，而是抓住唐蘭看法的關鍵——“是”“懿”二詞對舉，都爲稱美之詞，那麼，這一點無論從全文語境，還是從語法結構來看，都完全吻合。

從沈子簋銘文的全部內容看，銘文先追懷贊美了幾世祖先的功德和對後世的庇蔭，然後說造此簋的目的：一是要“用綏公唯壽”，二就是“用懷口我多弟子我孫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”一串文字。涉及第一個目的之“綏”爲“綏祭”，《儀禮·少牢饋食禮》：“上佐食以綏祭。”“用綏公唯壽”，就是用“簋”（盛物的器皿）綏祭，使公（“也”的祖先爵位爲公）^[9]“唯壽”。對後一串文字，唐蘭斷爲：“用懷口我多弟子我孫，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。”我們不知道裘錫圭先生是如何斷句的，臺灣《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》斷爲：“用懷口我多弟子、我孫克有型教。懿父乃是子。”這樣斷句，“懿父乃是子”仿佛是落款，但殷周金文中未見這種格式。唐先生的斷句前後貫通一致，並且合乎殷周銘尾勉勵當時和後世的特點。

不過，我們也有理由認爲，不能將“懿父乃是子”的“是”講作形容詞。因爲上古所有文獻中，真正可以認定爲形容詞的“是”始見於《詩經·魏風·園有桃》中“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”！而春秋或春秋之前的其他“是”，要麼可以確定爲指代詞；要麼像“X是V”式“是”，或“乃唯是喪我國”“有孚失是”中的“是”，即使不能確定爲指代詞，也可以確定不是形容詞。如果認爲這首例出現的“是”爲形容詞，就無法解釋：爲什麼最早這例“是”孤零零爲形容詞，而其他大量“是”都不是形容詞？如果說一個詞的某種用法的消失沒有什麼奇怪的，可爲什麼消失得無踪無迹後，春秋以後卻又出現了？一方面，孤零零的單例很難支持原初“是”的“形容詞說”，另一方面，見首見尾不見身的疑團也不能支持“形容詞說”。這正是“代詞說”派看到的問題。比較起來，“代詞說”的理由似乎更充分，因爲上古確有大

量“是”的指代詞性質是明明白白的。但如上述，原初“是”的“代詞說”也有難解的疑點，這就是越靠近西周早期的“是”越不像指代詞；而越不像指代詞的“是”就與形容詞“是”靠得越近。這是迄今爲止，漢語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語言現象之一。

可是，如果不把唐蘭和裘錫圭二位先生的意見對立起來，而是統一起來，即把二位先生各自看到的稱美的一面和指代的一面統一於一體，就可圓滿解釋這例最早的“是”以及上古所有有關“是”的難題。就這例最古老的“是”來說，可以這樣來分析：

沈子也造簋，除希望祖先“唯壽”，還希望先祖的功德惠及當世及子孫。怎樣惠及子孫呢？就是“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”。“型”是範式、楷模；“教”，《說文》：“上所施、下所效也”。“上所施”的“上”就是“父”；“下所效”的“下”就是“子”。這個“父”不是指沈子也的父親或其祖先，因爲沈子簋全文中分別稱他們爲“吾考”、“先王”、“先公”、“公”；這個“父”也不會指鑄簋者沈子也自己，因爲銘文中沈子也自稱“沈子”或“也”，而且不會有人在祭祀祖先時自稱“懿父”。我們認爲，“父”與“子”應該是泛指沈國先祖之下的一代又一代，而“是”爲肯定性指代詞，指示“懿父”。這樣，如果“乃”爲並列連詞，全句意爲：以先祖爲楷模，教化出有美德的父親以及具有父親這種美德的兒子。

當然，把“乃”看作並列連詞，可能會受到質疑，因爲這畢竟既不是“乃”最早的法，也不是主要用法。“乃”最早最主要的用法是表示：竭盡全力艱難地實現。《說文》：“乃，曳詞之難也。象氣之出難。”《左傳·宣公八年》有“雨，不克葬。庚寅，日中而克葬”。孔穎達《正義》曰：“定十五年九月‘丁巳，葬我君定公，雨，不克葬。戊午，日下昃，乃克葬’。彼云乃此。云而者，《公羊傳》曰：‘而者何？難也。乃者何？難也。曷爲或言而，或言乃？乃難乎而也。’何休云：‘難者，臣子重難，不得

以正日葬其君。言乃者，內而深，言而者，外而淺。下昃日昃久，故言乃。’”雖然今天一般僅把“乃”理解為副詞，理解為所謂“繼事之辭”^[10]，講作“然後”，但考察《左傳》中的“乃”却都不僅僅祇表示“繼事”，而同時都含有“難”義。比較準確地說，最初“乃”的意思相當於“這纔……”的意思。如果沈子簋這個“乃”作“難也”講，“懿父”之“懿”和“是子”之“是”的關係沒有變化，祇是需將唐蘭先生的斷句修改為“克有型教懿父，乃是子”，全句的意思就為：以先祖為楷模，教化出有美德的父親，這纔能培養出有這種美德的兒子。這樣，最古老的一例“是”就不是一個我們今天所瞭解的自身沒有實義的指代詞，而是具有實義的肯定性指代詞。

三 原初“是”的指代詞模式

發現最古的一例“是”為肯定性指代詞，其意義不僅在於使此例“是”得到了圓滿解釋，還使上古“是”的研究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況，出現了重大轉機。有關上古係詞來源問題有一系列長期不能解決的難題，例如：為什麼係詞明明白白是從“指代詞”發展而來，却隱含確認義？為什麼上古存在着一組近指代詞？為什麼是“是”而不是其他指代詞發展為係詞？如果我們能夠說明，原初“是”的特定功能是專門指代肯定性事物，含有肯定義，而不是像今天的指代詞那樣沒有實義，那麼，上述難題將不難解開。

當然，假如上古其他原初“是”的情況與此例“是”不吻合，那麼我們便祇能說這例最古老的“是”得到了一個說得過去的解釋而已，不能奢談別的。但更為全面的考察顯示，原初“是”的肯定性指代是普遍特徵，即專門指代祖先、神靈、祭器或神聖正義的行為等等，也就是說，它們全都同沈子簋這例最古

老的“是”一樣，專門指代尊崇、肯定的對象（作者已有另文專論^⑤）。因此，可以肯定：

一、原初“是”是作為肯定性代詞產生的，並因此區別於上古指代詞系統中的其他指代詞；二、原初“是”有指代和肯定兩個義素，這是它後來分化為指代詞和形容詞的內在根據；三、上古構成判斷句的“是”與“此”不同，它本身具有判斷性，這是它內在肯定性的一種表現形式，也是它演進為係詞後隱含的確認義的來源。

“是”的來源成因問題之所以成了一個長期解決不了的難題，是因為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指代詞模式的制約。迄今為止，我們所知道的指代詞，本身是沒有任何實義的，它的意義要由語用中它所指代的對象來賦予。在我們所瞭解的語言系統中，任何特定概念都與指代詞沒有必然聯繫，像正確、肯定一類概念更是與指代詞不相干。於是，原初“是”原本渾然一體的指代和肯定義素，在我們的理論框架中，祇能是風馬牛不相及、分屬不同詞類的；而原初“是”指代和肯定原本不可割裂的關係，也就被截然分開。因此，所謂係詞“是”上表現出的奇怪的指代詞“是”和形容詞“是”相互“抵牾”的現象，是我們的指代詞認識模式使然。

上古“是”同時具有指代和肯定義素這一特徵，並非隱微得全無迹象。實際上，幾十年前已有學者接觸到這一特徵。20世紀50年代，洪誠在他那篇影響很大的《論南北朝以前漢語中的係詞》一文中提到：演變為係詞的“是”“不是純粹指代詞”，“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義”^[11]。可惜，這一重要的問題是在論證係詞產生的時代問題時提到的，因而被淹沒於其中，沒有引起注意。林序達在70年代末甚至提到了指代“是”和形容“是”同源的問題，他說：“指示代詞‘是’之可以具有確認或肯定作用，事理完全可通。因為形容詞‘是’由指示代詞‘是’演變而

來，至少應該承認它們之間的同源關係。”^[12]提出指代“是”和肯定“是”是否同源的問題，應該說“是”的研究進行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十字路口。可以想見，如果不是由於現有代詞模式的制約，如果順着林序達先生的“同源說”，溝通“代詞說”和“形容詞說”，也許二十多年前就可以發現原初“是”的肯定實義性質。

發現原初“是”的實義性質和指代性、肯定性統一於一體的價值，不僅在於“是”問題的解決本身，還給我們一個啓示：學術上最困難之處，是對我們思維模式的反思。“是”的問題之所以難以發現，就因為它涉及了我們的基本理論模式。

〔注釋〕

- ① 周昭王在位的時間大致在公元前 1000 至前 977 年，而在此前的公元前 1066 年左右周武王滅商。（周武王克商之年，各書記載略異，《史記·魯世家》《齊世家》俱稱武王十一年（前 1066 年）克商。）
- ② 任學良認為“三千年以來，判斷詞‘是’都沒有發生重大變化”，“是”原本就是係詞，不存在演變問題。
- ③ 轉引自《漢語大字典》“愛”字①。
- ④ “愛”，西周金文、《易經》、《詩經·頌》均未見，今文《尚書·酒誥》中一例（僞古文《尚書》有多例）。“仁”，甲骨文和西周金文、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的《雅》《頌》均不見“仁”字，今文《尚書》中僅《金縢》中有一例（僞古文《尚書》有多例）。
- ⑤ 該文即將在《古漢語研究》發表。

〔主要參考文獻〕

- [1] 《論語》。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。
- [2] [6] 裘錫圭。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。中國語文。1979（6）。
- [3] 任學良。判斷詞“是”見於先秦說。杭州師範學院學報。1980（2）。

- [4] [8] 臺灣《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》沈子篹注釋。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1。
- [5]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。漢語大字典。縮印本。武漢：湖北辭書出版社，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2。
- [7] 唐蘭。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。沈子篹注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。
- [9] 唐蘭。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。沈子篹說明。
- [10] 蔡沈《書經集傳》：“乃者，繼事之辭。”見四書五經。影印本。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5。
- [11] 洪誠。論南北朝以前漢語中的係詞。語言研究，1957（2）。
- [12] 林序達。判斷詞“是”的形成和發展——兼與洪心衡等先生商榷。西南師範學院學報，1979（2）。

（肖姪曼 四川大學中文系 郵編：610064）